

26.32

268

比較考古學

陸肇

達生



57710

中華書局出版

百家 文庫・史論集

責任編輯：危丁明



書名：比較考古學隨筆
著者：李學勤
出版：中華書局（香港）有限公司
香港九龍彌敦道450—452號
印刷：美雅印刷製本有限公司
九龍觀塘榮業街6號4樓B1
版次：1991年10月初版
©1991 中華書局（香港）有限公司
國際書號：ISBN 962 231 637 9

比較考古學隨筆序

李學勤先生集合近年所著論文二十篇，總題曰：「比較考古學隨筆」。他在引言中提出比較研究應該有五個層次，即是：①中土不同時代的比較，②中土與邊緣地區的比較，③中土與鄰邦的比較，④中土與太平洋地區的比較，⑤中土與其他古文明的比較，漸次推進，可說是由近及遠。他不是一位純粹主張傳播論者，而是實事求是，揭橥一些在不同地區而有某種相同的文化現象，作出極有啟發性的提示。本書所指出的二十件大事都是富有興趣而能夠引人入勝的古史上的重要「問題點」。李先生與我為多年知好，他認為我在古史的鑽研方面和他有一些相同的傾向，故此引為同調，要我為他的著作寫幾句話，真使我受寵若驚，既有了「共同語言」，我亦不辭「佛頭著糞」之謔，斗

膽地答應了。

先民在踏入農業社會以前，有一段漫長的狩獵時代，當時的生活狀況可以說是行國，還不是居國，如果在氣候變化或者大型的軍事行動發生時，人口必有很大流動和轉徙，雖是天南地北之懸隔，由於傳播的結果亦可出現一些相同的東西。近代的古史學者，很喜歡從東西兩個極端作出比較的論點，從王國維的古籀分東西說，傅斯年的夷夏東西說，以至近時的文字上象形指事的東西說，已經成為一套濫調，反之，從南北的角度來看問題卻如鳳毛麟角。李先生書中對江西的吳城新干和百越文化所受到北方的影響，有十分有趣的分析，真是巨眼若燭。最近香港南丫島大灣瀕海地帶竟有帶鉗牙的玉璋出土，和二里頭及陝西神木的牙璋很相像（但與本書所談的三星堆蜀國式的歧尖加飾的牙璋不同），而大灣的彩陶紋樣與湖北大溪遺物有類似之處，亦足證明中原文化之南被。古書所說「五十萬人守五嶺」分明是誇大的話，但先秦禮器的傳播遠及海澨，正可為南北交流提供一物證。

李先生談規矩鏡、日晷、博局都是八極紋三位一體，我嘗推測安徽含山玉龜裏頭所

夾的玉片上面的紋樣即指示八方、八極，是空間觀念的表現而不是曆法，玉片鐫刻的小圓點作數字的排列，可與河圖洛書比較，而玉版夾在靈龜中，不啻是「河圖玉版」的寫照。（文見拙作《史溯》）

談及西北絲路，李先生指出虎噬鹿器諸動物紋樣與斯基泰文化的關係。按Scythian即是所謂塞族，本稱Saka，其名見於出土之古波斯文石碑。斯基泰本為波斯國之一省，Saka於埃蘭文（Elan）作ša-ak-ga，阿卡得文（Akkadian）文作gi-mi(r)-ri，希臘文作ε(s)kiøjs，與西北民族有甚深之血緣關係，周原召陳村出土蚌雕外國人頭像頭頂鐫一壬字，有人說即是塞族。我曾指出這個壬的記號在西亞公元五千五百前Halaf地區的陶器和女神肩膀上亦刻有壬的標識（說見拙作《絲綢之路引起的文字起源問題》），西亞與中國交往在近年考古學上的物證像瑪瑙珠在滇池區域出土之多，只江川李家山墓地即有八〇七九枚。（詳張增祺：《戰國至西漢時期滇池區域發現的西亞文物》）廣東南越文王墓的銀盒，已被證明為波斯Xerxes一世（公元前四八五至四六五年）時期的遺物（見附圖二）。中外文物交流的年代已可推前，早期商業貿易的記載包括陸路與海道，

如《魏書·西域傳》所說：「大月氏世祖時，其國人商販至京師自云能鑄石爲五色玻璃。」（《梁四公記》說：「扶南大舶從西天竺國來，賣碧玻璃鏡……」）（《太平廣記》八一引）我們看楚滇各地的玻璃器以至廣東肇慶戰國墓和南越王墓出土之琉璃均可證明上面的記載事實上在先秦時代已是如此。吳時薛綜上疏有云：「貴致遠珍名珠、香藥、象牙、犀角、瑣瑁、珊瑚、琉璃……奇物充備寶玩。」南越主墓中的各種寶玩正說明海上商販在西漢初期已是相當發達了。

楊希枚兄分析西北岡出土的三百九十八具人頭骨的複雜性，其中有海洋類黑人種，第五組他懷疑與印度人的頭骨很接近，又證明有二三具幾乎無殊於歐洲的類是高加索人種。我在一九七三年考證印度的 *cina-patta* 與蜀布的關係，附帶提到昆侖船和古代海上絲綢之路，現在已成為熱烈討論的課題。張秉權著《甲骨上黏附的棉布》一文指出殷代出土龜甲雜有棉布，即土盧布，相當榜葛刺國所謂兜羅棉，此外武夷山船棺葬亦出有棉布，證明身毒貨物在殷代已有交流跡象。在北高加索山區的巴勒卡（峪）海拔一千尺墓葬出土絲織品多件，其中文書殘片有漢文三行，（俄文考古報告，見張廣達《論隋唐時

期中原與西域文化交流的幾個特點》（北京大學學報一九八五，第四期）此為唐代遺物，遠古情形，還有待於進一步研究。

銅在西亞起源甚早，即其初文，楔形文稱urd-du。姜寨第一期遺物出有黃銅片和黃銅管狀物，冶煉方法比較原始。甘肅齊家文化火燒溝文化發現銅器遺址，時代相當於夏，文獻的記載像墨子耕柱篇說：「昔者夏后開（啟）使蜚廉采金於山川，而陶鑄於昆吾。」鑄銅始於夏，古代已有此說，和出土文物正可印證。

記得若干年前，故友三上次男博士自埃及考察返國，道經香港贈給我一些在中東遺址拾得的陶片，我說古代東方陶瓷傳入近東，和阿拉伯人經商的香料之路有同等價值，後來他寫成《陶磁之路》一書，影響至今。李君書中有二章敍述銅鏡在中東一帶傳播，描寫至為生動。大家習慣「絲綢之路」一名，其實，以某種特產在商業活動上來代表文化之交流，銅鏡之路、香藥之路、陶瓷之路和絲綢之路是同樣重要的！

我近年研究陶器上的符號，相信新石器時代，老早已開拓了「陶（瓷）之路」，形成東西文化上的接觸，三上博士的說法可以推前，從許多相同的陶符分佈情形看來，遠

古時期不免互有交往，我的看法有下列幾點：

①文字未形成以前，有一段漫長時間，流行某一記號，代表某些吉利、富有的意義，可說是「陶符時代」。

②這些同形陶符的傳播，東南地區亦會出現，諸夏境內，一向華夷戎狄雜處，正可說明這一現象。

③中外亦有不少同形記號，我嘗舉出凸、兀、⊗……等字為例，說明古代陶器之路早已存在。

我另有專書作詳細研究，李先生比較中埃文字發展的過程，有類似之處，他很關心這一問題，我希望李先生他日亦為我的書寫一序文，斟酌切磋，投桃報李，李先生定必能首肯的。

李先生此書以深入淺出的文字，提出許多斬新有趣的問題，論點十分可貴。他的廣博的視野和縝密的分析，加上他有機緣接觸許多實物作仔細的考察，所得的結論，不是一般關在屋子裏作海客「談瀛」的人們所能做到的。

本書的出版，無異古史學與考古學二大流結合誕生的一個新果實，是一項重要成就，我想讀者看過本書之後，必有與我相同的感受。

饒宗頤 一九九一年六月

目 錄

一	引言.....
二	青銅器與商、周文化的關係.....
三	曲阜周代墓葬的兩個類型.....
四	規矩鏡、日晷、博局.....
五	三星堆與大洋洲（上）.....
六	三星堆與大洋洲（下）.....
七	百越的尊、卣.....
八	蜀國的璋、彝.....
九	中國銅鏡的起源及傳播.....
十	續論中國銅鏡的傳播.....

十一 中國和中亞的馬車	一〇四
十二 虎噬鹿器座與有翼神獸	一一七
十三 新西蘭玉器的啓示	一二六
十四 甲骨占卜的比較研究	一三九
十五 印第安人的「饕餮紋」	一五一
十六 土墩墓異同論	一六四
十七 早期的銅、鐵器	一七五
十八 古埃及與中國文字的起源	一八七
十九 「片雲威」的故事	一九七
二十 中、日、英三國出土木簡	二一〇
後記	二二一

插圖目錄

圖一	四神規矩鏡	三一
圖二	石日晷	三六
圖三	銅人	四九
圖四	玉璋	七七
圖五	蜀國銅璽	七七
圖六	齊家文化銅鏡	八六
圖七	重圈昭明鏡（據江上波夫）	九六
圖八	殷墟車復原圖（據楊寶成）	一〇七
圖九	斯基泰神獸	一二三
圖十	魚鈎形玉飾	一二三
圖十一	魚鈎形玉飾	一三〇

圖十二	印南伽玉飾	一三一
圖十三	雙珂魯式玉飾	一一一
圖十四	珂魯式玉飾	一一一
圖十五	鳥形玉飾	一一一
圖十六	三瑪納雅式玉飾	一三一
圖十七	鈎雲形玉佩	一三一
圖十八	玉片圖案	一三六
圖十九	商代饕餮紋	一五四
圖二十	海達人花紋（據朱狄）	一五四
圖二十一	銀鍔花紋（據鮑亞士）	一五七
圖二十二	玉璜	一六〇
圖二十三	箱匣花紋（據鮑亞士）	一六〇
圖二十四	「祭壇」與墓葬	一七三

圖二十五 埃及符號和文字	一九三
圖二十六 異形鉞	一〇二
圖二十七 ϵ 形鉞	一〇三
圖二十八 ϵ 形鉞	一〇四
圖二十九 眼形鉞	一〇七
圖三十 書信簡	一一八
圖三十一 帳簿簡	一一八

一 引言

這本小書在標題上寫出「比較考古學」的字樣，目的並不是要杜撰一項學科，藉以標新立異。我的想法只是要強調一下比較研究在考古學中的重要性，希望有更多的人重視這種研究方法，致力於有關的探討，使考古學——特別是中國考古學得到更豐富的成果。

比較研究方法在文史方面的運用，可以說由來已久。比較文學、比較文學史、比較史學等名詞，是大家早就熟悉的。中國學者對歷史文化領域如何進行比較研究，近年有較多論述。例如周谷城先生的〈中外歷史的比較研究〉一文說：「比較研究，即經常拿彼此不同的東西對照着的意思。這樣作，可以使我們易於看出一些不應有的偏見。例

如「古典時期」一詞，原來本是只適用於希臘、羅馬。但學者們爲着要完成一個以歐洲爲中心的歷史體系，便不得不把印度、中國、波斯等，也納入古典時期之下。」他還列舉了一些事例，然後說：「……這類情況，我們如果不採比較研究的方法，或者自始即讀世界史，而不研究一點中國史，換句話說，即不拿中外歷史對照着看，就很容易看得清，就很不容易作進一步的考慮，或更切合現實的考慮。」他提到他的《世界通史》第一卷講到六個古文化區，即尼羅河流域、西亞文化區、愛琴文化區、中國文化區、印度河流域、中美文化區等，有分區並立，其反面必然是往來交叉，「如果不用比較研究或對照看的方法，則不易看出其重要性，即使看到了也不易從正面突出，給予應有的敘述」。

考古學的情況更是這樣。周谷城先生提到的幾個古文化區，在很大程度上正是建立在考古的探究上的。即使在一個地區、一個國家之內，還可存在若干種文化，彼此並立，互相融會交流。對這些文化的同異，有必要進行比較考察；對不同的文化區間的同異，也應加以比較研究。比較研究方法在考古學領域內，實在是大有用武之地。

中國和外國的考古學有着各自的淵源。現代考古學在歐洲形成，是在十九世紀前期，其前身是所謂古物學（antiquarianism）。中國的考古學則是在二十世紀前期現代考古學傳入後建立的，它的基礎則是傳統的金石學。金石學在中國有悠久的歷史，為考古學的興起準備了豐富的憑藉和材料。同時，中國幅員廣闊，文化綿遠，地上地下有非常豐富的文物寶藏，更使中國考古學有強烈的自身特點。中國考古學者每每局限於國內考古的知識和經驗，外國考古學者又多因語言障礙，不能直接吸收中國考古學的大量內涵，結果是雙方難以溝通，妨害了比較研究的開展。

要把中外考古學真正溝通起來，僅靠考古報告和論著的介紹、翻譯是不夠的。必須對古代各地區、各國家的文化作通盤的觀察，以整個人類的歷史發展為背景，進行細緻的對比研究。這樣，就可以看到各種文化的同異，揭示一些文化間交流影響的關係，並對各個文化在歷史上的地位和貢獻作出恰當的估計，這正是比較考古學設想達到的目的。

比較研究對中國考古學的發展也有很大幫助。事實上，幾位為在中國建立現代考古學作出貢獻的學者，都以博大的眼界，在不同的研究領域中運用過比較研究的方法。例